

書名：《漢學書評》

作者：楊聯陞

出版：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2016 年 8 月

頁數：467 頁

前輩學者有人願意花 50 年時間在書評這塊園地持續耕耘，並在漢學界闖出天地，不可不以楊聯陞（1914—1990）先生為代表之一。楊聯陞的書評在兩岸陸續都有出版，見於他的《漢學散策》、《國史探微》、《漢學論評集》等書；而 2016 年 8 月由大陸蔣力編輯《漢學書評》（商務印書館）值得關注，是楊聯陞的書評論文第一次以中文方式大規模與讀者見面。

翻開全書目錄，首先映入眼簾是楊先生的書評內容是全方面的成果。扼要地說：現今書評距離楊先生時代已過半世紀，稍略考察當時書評的內涵與意義是十分有必要的，對於書評發展自然也是相當有益處。限於篇幅，無法對每篇書評進行一定程度的解說，這是要向讀者說明與致歉的。以下將依序說明楊先生書評的內涵與意義：

《食貨》樹立的優良學風。楊先生早期受《食貨》半月刊學風影響，強調經濟史、地方志閱讀的重要，這是他早期研究最值得注意事項之一。他在 1936 年於《大公報·史地周刊》評論冀朝鼎《中國歷史中的經濟要區》就曾提到：“近來研究經濟史的頗知道注意地方志，如食貨學會的陶希聖先生、鞠清遠先生均曾著文提倡讀地方志。但是到如今還不見有什麼成績，我們遠在海外的朋友反而先有這樣的成就了。”（頁 5）同年 8 月《食貨》半月刊第 4 卷第 6 期，評陳嘯江《西漢社會經濟研究》，也是同時代產物。楊先生有能力從經濟史中看出一些為人忽略的歷史事實，例如漢代的奴隸並非不生產的（頁 9）、更列舉王莽兒子殺奴婢，莽竟要他抵命的極端例子加以證明奴隸也絕非沒有受到律法一定程度的保障。（頁 10）食貨學會注重經濟史，史料中出現數據方面的綫索，楊先生

在這方面也特別突出。例如他在1950年評論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馮家昇《中國遼代社會史(907—1125)》中的“南京路1123年歲入(貫)”,即是如他所說“做了一點數學查驗,發現要使數字相符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在四處做一點輕微的修改,再重新做一個表”(頁180)。更加強了他所說“必須深入中國文獻的内部而盡其曲折,然後才能進一步提出自己的心得”。

嚴肅面對翻譯工作。由於楊先生身處西方學術界,將原有中國史料譯成英文,這是相當艱難不易的工作。楊先生1946年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就是《晉書食貨志譯注》,在此方面打下堅實基礎。他在1943年評論韋爾伯(C. Martin Wilbur)《前漢奴隸制度》時,就曾有感而發於文末寫道:“中國人寫論文引中國書向來不翻譯,實在作者懂不懂所引的書,有時候真成問題,西洋人引中國書必須翻譯,所以他們的學者讀書,有時候很細,這是我們應該效法的。”(頁16)現在看來這段話也絲毫不過時,並透過翻譯將研究的意義展現出來。

對於匯纂資料的特別重視。尤其是俗文學研究,例如詩詞曲、小說類這種匯纂資料的工作,更為楊先生所重視。通俗作品多摻雜口語方言,適度整理、加以解說將有助於理解各地不同、相同、相似用法。不但事半功倍,亦可免於誤用。如此工作在清代已有明顯進展,劉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經傳釋詞》都是訓詁學問基礎上,一棒接一棒的接力工作。楊先生自然也留意以上現象,他是真正從訓詁嚴謹的清華學派出身。1957年他評論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可看出是對於匯纂資料致上崇高敬意的一篇評論。1966年評論陸澹安《小說詞語匯釋》,更指出“這是一本讀中國舊小說的人同研究明清時代風俗事物的人不可不備的書”(頁34)。對於匯纂資料的重視有跡可尋,絕不是偶然為之的。

慧眼獨具,提攜後進。楊先生曾在《書評經驗談》提到:“寫書評可以長學問,交朋友,今日雖無科舉,新進亦頗願有大力者推薦,為己而亦為人,何樂而不為哉!”(頁467)因此我們通覽全書書評,可以看到楊先生筆下作者,絕非都是楊先生的前輩學者;有學術潛力、蓄勢待發而在研究領域默默耕耘、剛剛嶄露頭角者,亦在楊先生慧眼獨具下更廣為世人所知,對於後輩學術道路更是一種實質上的鼓勵。這就回到他所說的“新進亦頗願有大力者推薦”上了。具體例子很多,例如1971年《關於唐宋商業的兩本書》,其中介紹斯波義信《宋代商業

史研究》，全書分爲八章，一一列出，亦寫信加以鼓勵——“淹博精密，至爲可佩”（頁 54）。1982 年評論《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對於張廣達《吐蕃飛鳥使與吐蕃傳驛制度——兼論敦煌行人部落》，張廣達、榮新江《關於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皆持肯定態度——言道皆是“同行必須參考的”（頁 101）。楊先生說：“榮新江君是北大歷史系本科生，與廣達先生師生合作，不但可爲佳話，也希望可爲佳例（在西洋理工科師生合作之例甚多，文法科偶然有之，值得提倡）。”（頁 101）不用說，以上可知提攜後輩的工作也落實在楊先生自己的書評工作上，成爲另一佳例。

對文學典故的準確解讀。因爲本書“基本上匯集了楊聯陞的書評文字，體現了楊聯陞書評的全貌，至少也是十得其九”（頁 v），而透過編輯工作，讓我們見到楊先生的文學書評面貌，特點在於典故解讀，配合文本詮釋，讀者因而更能進入文學家的內心世界了。1962、1963 年間，評論牟復禮（F. W. Mote）《詩人高啟（1336—1374）》《答內寄》：“風從故鄉來，吹詩達京縣。讀之見君心，寧徒見君面”中的最後一句；楊先生說：“最後一句的原文‘寧徒見君面’包含著一個文學典故。根據《顏氏家訓》第 19 章雜藝，中國南方有一句諺語‘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大致意思是說，寫信人可以通過書信與遠在千里之外的受信人見面。因此後兩句的意思是，你的書信向我敞露心懷，甚至勝於當面相見”（頁 401—402）。所以，牟復禮翻譯最後一句“寧徒見君面”，（I would prefer to be able to see your face）如果考量以上典故，那麼能夠翻譯得比原先更能掌握到高啟心意，由此可知文學典故的準確解讀是有必要的。

漢學書評的大觀園地。楊先生曾說：“1940 年起的十年，是我打入西洋漢學最用力的時期”（頁 463）。以及“我的主要功力，用在四十年代。當時漢學中心在西方仍在巴黎，沙畹、馬伯樂、伯希和三大賢戰後只剩下伯希和一位，主編《通報》，常寫書評”（頁 461）。楊先生當時在哈佛燕京學社服務，提到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是合作夥伴，提及“他主持 HJAS 有年，那時我幾乎是書評編輯（review editor），有意無意地與《通報》爭先”（頁 462）。如此看來，似乎楊先生將漢學分爲法國漢學與美國漢學，并有孰爲中心之爭了。然而，綜覽全書過後發現以上論斷是不正確的，因爲楊先生的漢學眼光沒有中心，亦即中

心無所不在,只有高水準值得參考的著作爲基準,並沒有國籍之分。

根據以上內涵與意義,全書的知識貢獻、論述方法、最核心的特色,便可以清楚看出來:

知識貢獻方面,楊先生書評涉及的內容可以分成兩點來談。第一,關於知識內容的擴張。不能將楊先生僅僅視爲一位墨守清代訓詁治學門徑的學者,他的學術主張不是傳統訓練下的考據研究能夠看出來。必須再加上他在西方學界接受各種嚴謹的訓練,以及接觸種種不同學風,才使他的研究“深入中國文獻的內部而盡其曲折”。這樣的“深入”與“盡其曲折”最終都必須透過“漢學研究”這把鑰匙才能打開嶄新視野、一探究竟。他擴大了漢學知識的邊界,也可以說變成了沒有邊界,不再以中國觀點爲中心來解讀,而是真正世界性的學問。第二,關於知識體系的建立。楊先生的涉獵相當廣泛,看似雜學、沒有章法,其實這是嚴重誤解。以比喻說明,將散落的銅錢,用綫將其貫穿以便於攜帶;雖然撿一錢有一錢的好處,但楊先生更懂得貫穿的好處。因此,這條綫又可比喻成楊先生在解讀文獻,在研究每一個議題自有每一議題因收穫帶來的好處,而不畫地自限;如此看待中國文化內容,自然呈現一種有機體,避免以管窺天。

論述方法方面,楊先生書評論述方法約略可以分成幾個面向。首先是“漢學看門的高度自覺”,拜讀書評全部內容,得知楊先生的評論方法在於對書中每條證據與論斷均認真查證,他的確如自己所說:“自比漢學的看門人”。指出“某頁某行何字應作何字”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正是對於“漢學看門高度自覺”的最好印證。其次,“字斟句酌的工夫養成”,一部一部都是如此,也形成他的評論方法。重要的是:若非如此,許多學術問題也許輕輕放過,而失去探索機會了。1968年他在評論劉若愚《中國之俠》時,提到方以智對於“任俠”、“游俠”已有概略區分;章太炎說得清楚一些,提到“大俠不世出而擊刺之萌興”,楊先生的解釋是:“大俠大約相當於任俠,而擊刺之萌即劍客,相當於游俠。”(頁43)依照這樣觀點,我們對於“俠”的認識有了進一步區別。最後,則是“注重制度中的人群活動”:楊先生從事經濟史研究,對於制度史方面更是瞭若指掌,這是衆所周知的;然而,我發現到楊先生在經濟、制度的底層,論述上還是儘量回

歸對於人群活動的看重，顯得更有“立體感”。上文提及對奴隸的看法就是其中一例。特別的是，有些親屬關係也因透過楊先生的評論而引人關注。再如1949年評論馬里恩·J. 李維(Marion J. Levy, Jr.)《近代中國的家庭革命》，認為應該要討論兄弟的長幼問題。楊先生說：“在傳統的中國，兄長與弟媳之間是迴避關係，相當於公公與兒媳間的關係。然而，弟弟與嫂子之間的關係則可以親密得多，年齡差別大時尤其是這樣。諺語有云：長嫂比母，小叔是兒。”(頁168)楊先生的論述方法是觀察其中人群活動的種種現象，思考為何如此，以及在歷史中產生什麼樣的作用與影響。

核心特色方面：可以說當代願意將書評作為平生志業的學者，應該不會佔大多數吧。然而，前輩學者有人願意用50年時間在書評這塊園地持續耕耘，不能不以楊先生為核心、為特色。至此也明白楊先生所說：“許多人認為書評不重要。我則以為一門學問之進展，常有賴於公平的評介。很盼望像西洋、日本，養成良好的風氣。”(頁458)換言之，西洋、日本良好的學術風氣，書評正是起了關鍵的作用，早已習以為常；如今我們要努力的，就是把楊先生的諄諄教誨透過書評，將良好的學術風氣逐漸建立起來。楊先生書評內容範圍相當廣泛，如果真的要一句話形容他書評中的核心特色，我想借用他說的話當成結尾：“我採取的是聯絡人而不是打手或監察員的角色，力求這些評論有幫助、客觀而且直截了當；它們有時有所批評，但絕無貶損或攻擊之意”(頁iv)。豈不適宜！

(作者：莆田學院媽祖文化研究院 梁右典)